



汉晋时期佛像八凤镜新论

黄 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101)

【关键词】佛像八凤镜;佛像图案;汉晋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佛教

【摘要】根据对鸟纹的表现方式,汉晋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的佛像八凤镜可以具体分为三类:A类出现最早,可以上溯至3世纪前期;B类流行于3世纪中后期,是佛像八凤镜中的主流;C类流行于3世纪末4世纪初,为该镜种的末期,佛像纹饰随着镜种的衰落而逐渐消亡。佛像八凤镜装饰的佛教图案包括坐佛、半跏思惟像及天人像等造型,是以3世纪时印度犍陀罗地区表现佛神通广大的图像及佛传故事图为底本创作的,与中国北方佛教南传初期的整体发展情况相适应。同时,佛教图像只是作为一种祥瑞图案,与神仙、瑞兽等形象混用于铜镜纹饰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神仙道教为主流信仰的汉晋社会对新传入的佛教所持有的包容态度。

DOI:10.13635/j.cnki.wwwcq.2021.04.005

长江中下游地区曾出现了一批装饰佛教图案的汉晋时期八凤镜^①,因涉及早期佛教文化因素,引起了学界的广泛重视。徐苹芳认为,在铜镜上使用佛像纹饰是吴镜的重要特点之一^[1]。王仲殊系统梳理了佛像八凤镜的资料,并结合出土墓葬的年代判断其为吴镜,流行于吴中期至后期,同时认为佛像八凤镜的出现是佛教在吴地流行的结果,而早期佛教对道教存在依附关系^[2]。佛教图案作为一种全新的铜镜纹饰自有其参考的底本,对其进行溯源可以从侧面揭示出当时佛教的发展面貌,加之近年来关于汉晋铜镜的研究不

断深入,为判断佛像八凤镜的产地及制作时间提供了参考,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佛像八凤镜的相关问题进行再探讨。

一、佛像八凤镜的年代

对佛像八凤镜的年代进行判定离不开对八凤镜整体年代和变化趋势的分析。

八凤镜是以从钮座延伸出的四叶纹及其间两两相对的八只凤鸟为主要纹饰特征的镜种,因在日本古坟时代的随葬品中也有发现而首先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普遍关注。带有纪年的八凤镜较少,仅有元兴元年(105)镜及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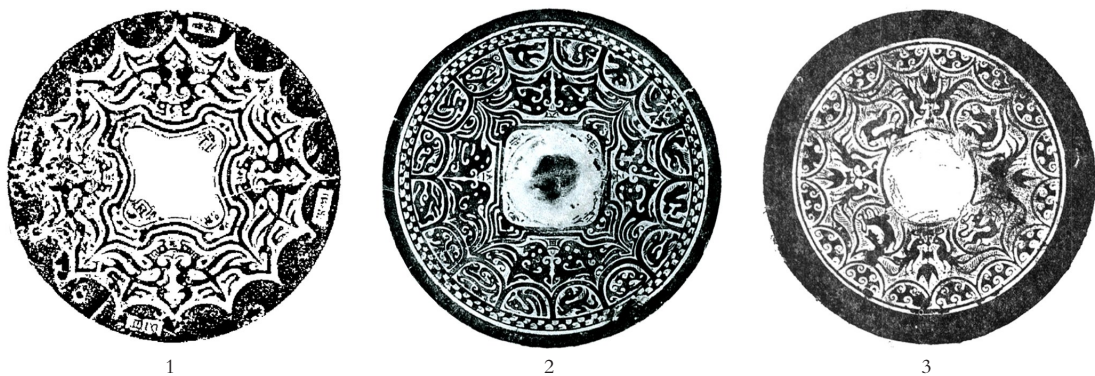
^①亦有“变形四叶纹镜”“夔凤镜”等名称,因主纹为八只凤鸟,且部分铜镜带有“八爵相向法古始”的铭文,故本文统一使用更为直观的“八凤镜”这一名称。

嘉元年(145)镜两件,因此樋口隆康^[3]、冈内三真^[4]、秋山进午^[5]、原田三寿^[6]等学者均尝试根据纹饰对八风镜进行分期研究。近年来,冈村秀典在综合研究汉晋铜镜的基础上,对不同地区的工匠系统进行了辨识,明确提出八风镜最早产生于华西地区,2世纪80年代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江南系八风镜^[7]。他还进一步对八风镜钮座的变化规律进行了总结,认为2世纪的华西系镜使用“丝卷形”(四边内凹的圆角方形)和蝙蝠纹钮座(图一,1),到2世纪后半段,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的八风镜钮座为圆角方形(图一,2),3世纪则演变成宝珠形(图一,3)^[8]。综合各方观点可知,八风镜的演变规律为钮座逐渐变圆,对鸟纹由抽象变为写实,铭文逐渐减少以至消失。

根据笔者搜集到的资料,目前公布的佛像八风镜共计17件,均为宝珠形钮座,按冈村秀典的研究,应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制作。其中,馆藏品6件,出土地点均不详;发掘出土者11件,分布于湖北鄂州,湖南长沙,江西南昌、靖安,江苏南京,浙江武义、安吉等地(见表一)。根据对鸟纹的表现方式,这17件佛像八风镜可以分为三类:

A类 3件。对鸟纹用不同类型的线条表现,较为图案化,二鸟喙部相接,头部呈C形,身体呈D形,尾羽较长,延伸至四叶纹的末端。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八风镜^[9],四叶纹中一叶内饰一佛二胁侍,其他三叶内饰盘曲的龙纹。对鸟纹头顶有向后翻卷的羽冠,颈部前端有钩状卷曲,颈部与身体交汇处有一斜线,以该线为起点,用四条向后的斜线表现羽翼。鸟身下各有一向前延伸的曲线在对鸟中间相交,似为鸟足。每对凤鸟头顶之间置一铭文,共4字,仅“宜”“公”2字可辨。对鸟纹外侧饰16连弧,其中两弧内各饰一天人,其余饰青龙、朱雀、赤乌等图案(图二,1)。江西南昌火车站站前广场M6出土佛像八风镜(M6:1)^[9],纹饰特征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藏镜基本一致,只是线条较细,且四叶纹内不见一佛二胁侍,仅连弧纹中的一弧内有一天人(图二,2)。

此类佛像八风镜上的佛教图案主要有坐佛和天人两种。坐佛均头顶肉髻,有圆形头光,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两侧有胁侍天人,装饰在四叶纹中的一叶内,如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藏镜和波士顿美术馆藏



图一 八风镜的纹饰变化

1. 四川巴县沙坪坝采集“元兴元年”镜
2. 湖北鄂州鄂钢西山铁矿工地105号墓出土镜
3. 江苏扬州胥浦70号墓出土镜

表一 佛像八凤镜信息一览表

编号	出土 / 收藏地点	类型	佛像位置及数量
1	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	A	四叶纹一叶内有1坐佛2胁侍天人,连弧纹二弧内各有1天人
2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A	四叶纹一叶内有1坐佛2胁侍天人,连弧纹二弧内各有1天人
3	江西南昌火车站站前广场 M6	A	连弧纹一弧内有1天人
4	湖北鄂州 M2080 (焦化车间 M62)	B	四叶纹一叶内有1天人
5	湖北鄂州 M4009(五里墩 M13)	B	外缘纹饰带内有2天人
6	湖北鄂州 M4037 (1975年鄂州五里墩)	B	四叶纹三叶内各有1坐佛,一叶内有1思惟像
7	1986年湖北鄂州鄂城重型机械厂1号墓	B	四叶纹三叶内各有1坐佛2胁侍天人
8	江苏南京西善桥吴晋墓	B	连弧纹一弧内有1天人
9	湖南长沙左家塘西晋墓	B	四叶纹二叶内各有1思惟像
10	江西靖安虎山墓地 M2	B	连弧纹一弧内有1天人
11	浙江武义吴墓	B	四叶纹二叶内各有1天人,一叶内有1坐佛2胁侍天人
12	浙江省博物馆	B	四叶纹一叶内有双天人像,连弧纹三弧内各有1天人
13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B	四叶纹三叶内各有1坐佛,一叶内有1思惟像
14	清华大学博物馆	B	四叶纹二叶内各有1坐佛(镜仅存一半)
15	德国柏林国立博物馆	C	连弧纹三弧内各有1天人
16	1994年湖北鄂州供电大楼	C	四叶纹一叶内有1天人
17	浙江安吉梅溪	C	主纹为2思惟像与1西王母、1东王公相间分布

镜^[2]。天人均头顶肉髻,大多有圆形头光,双手上举至头部两侧,双腿微分,帔帛在身体两侧飘扬,具体有两种形态:一种身躯较直,胁侍于坐佛旁;一种身体呈U形,作飞行状,单独装饰在镜外区的连弧内,如南昌火车站站前广场M6:1^[9]。

A类佛像八凤镜中仅南昌火车站站前广场M6出土铜镜有明确的出土地点,但因墓葬破坏严重,具体年代不明。纹饰特征类似的无佛像八凤镜出土例也较少,同样缺乏可以明确判断年代的墓葬信息。从八凤镜形制的整体变化趋势来看,A类镜已使用3世纪时流行的宝珠式钮座,但较为图案化的对鸟纹表

现方式和对鸟间的四字铭则承袭了2世纪后半段八凤镜的特征,应处于汉镜向吴镜的过渡阶段,因此,A类佛像八凤镜的制作年代可以大致推定为3世纪前期。

B类 11件。对鸟纹较为写实,不再仅用线条勾出各部分的轮廓,而是连成一个整体。鸟羽翼上扬,尾羽缩短,身下的双足清晰可见。1975年在湖北鄂州五里墩发现的孙吴后期墓M4037中出土有一件佛像八凤镜(M4037:1),对鸟纹刻画写实,胸前刻三根上扬的羽毛,翼部和尾部均用不同线条细致地表现出翎毛。两鸟中间的空隙处有自钮座延伸至连弧纹之间的穗状物。四叶纹内均饰佛

像,其中三叶内各饰一坐佛,一叶内饰思惟像。对鸟纹外侧饰16连弧,其内饰青龙、朱雀、白虎等瑞兽图案(图三,1)^[10]。

此类镜的佛教图案有坐佛、思惟像、天人三种。坐佛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为两侧有二胁侍天人的三尊像,与A类镜坐佛形象相同,装饰在四叶纹中的一叶或三叶内,如湖北鄂州鄂城重型机械厂1号墓出土镜^[11]和浙江武义吴墓出土镜^[12];一种为单尊像,坐于两侧有细长脖颈的双兽莲花座上,装饰在四叶纹中的两叶或三叶内,如上引湖北鄂州M4037:1^[10],以及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镜^[2]和清华大学博物馆藏镜^[13]。思惟像均为半跏趺坐于莲花座上,有圆形头光,一条手臂弯曲,置于脸颊附近,同侧腿自然下垂,另一腿弯曲上盘,一侧有撑伞人物,另一侧有跪拜人物,装饰在四叶纹中的一叶或二叶内,如湖南长沙左家塘西晋墓出土镜(图三,3)^[14]和湖北鄂州M4037:1^[10]等。天人也有两种形态。一种身躯较直,成对出现在四叶纹的一叶内,如浙江省博物馆藏镜^[2]。一种身体呈U形,与A类镜

天人造型相同,但装饰位置更加多样:有的装饰在连弧纹中的一弧或三弧内,如江苏南京西善吴晋墓出土镜^[15]和江西靖安虎山M2出土镜(图三,4)^[16]等;有的装饰在四叶纹的一叶内,如湖北鄂州M2080出土镜^[10]和浙江武义吴墓出土镜^[12];有的装饰在镜背外缘的纹饰带内,如湖北鄂州M4009出土镜^[10](图三,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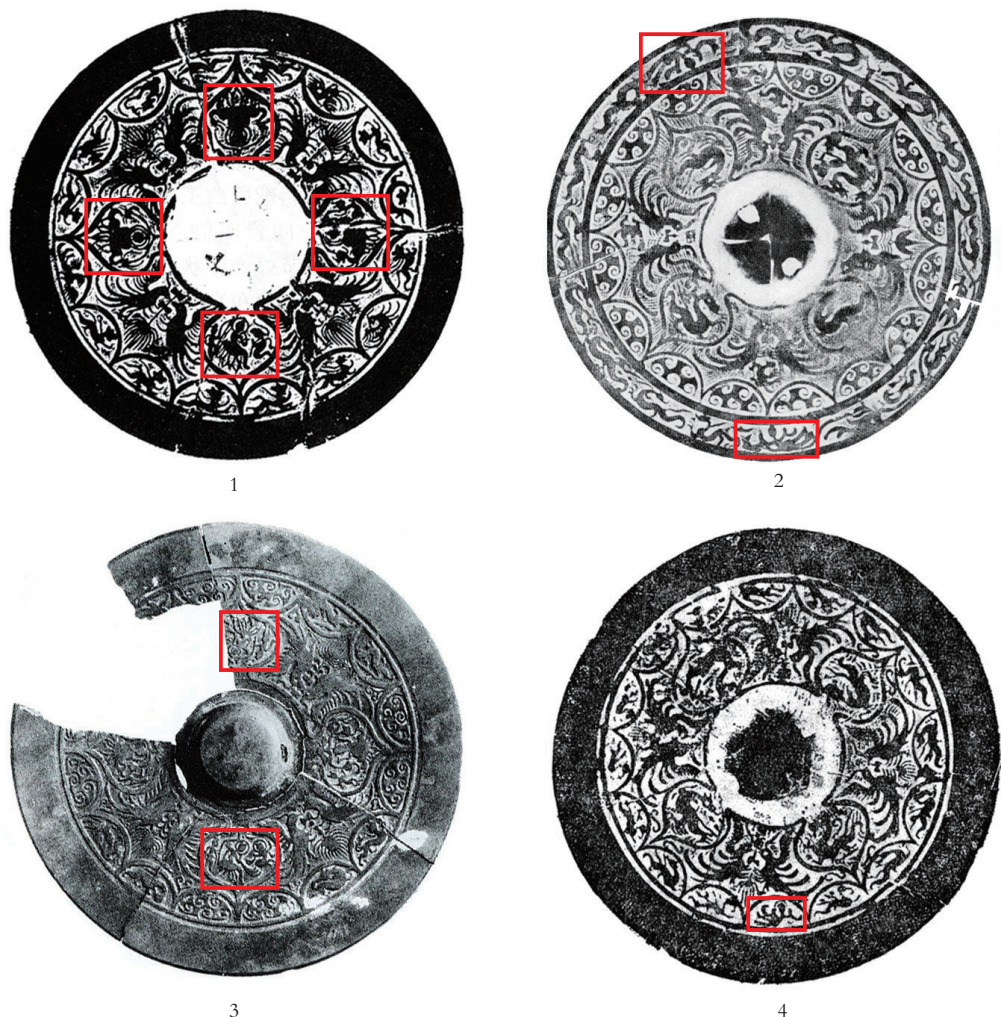
从出土铜镜墓葬年代来看,湖北鄂州M4009、M4037为孙吴后期墓葬,鄂州M2080、鄂城重型机械厂1号墓为西晋墓,江西靖安虎山2号墓发现“太康九年(288)”纪年墓砖,亦为西晋墓,江苏南京西善桥、湖南长沙左家塘、浙江武义等地墓葬均为吴晋时期墓葬,可知B类佛像八凤镜均出土于孙吴后期和西晋时期墓葬中。由于铜镜制作与墓主人葬可能存在较大的时间差,故该类佛像八凤镜的制作时间最早可以推断为3世纪中期,最晚至3世纪后期。

C类 3件。对鸟纹开始简化变形。如浙江安吉梅溪出土铜镜^[17],四叶纹内饰瑞兽,



图二 A类佛像八凤镜

1. 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藏镜 2. 江西南昌火车站前广场M6:1



图三 B类佛像八凤镜

1.湖北鄂州 M4037:1 2.湖北鄂州 M4009:1 3.湖南长沙左家塘西晋墓出土镜 4.江西靖安虎山 M2 出土镜

8只凤鸟缩小至四叶纹两侧,且形态不统一,一侧作回首衔羽状,另一侧作展翅伫立状,刻画简单。二思惟像和二神仙像成为主纹。神仙像分别为头戴胜形饰的西王母及头戴山字冠的东王公,东王公两侧各有一羽人举华盖(图四,1)。1994年湖北鄂州供电大楼出土有一件佛像八凤镜^[1],对鸟纹缩小并简化,镜背纹饰布局对称性较差,四叶纹大小不一,纹饰刻画粗糙,连弧所占镜背比例扩大且仅有

12个(图四,2)。

此类镜的佛教图案有思惟像、天人两种。思惟像与B类镜思惟像造型相同,置于主纹的位置,如浙江安吉梅溪出土铜镜^[17]。天人有两种形态,一种身躯较直,单独装饰在四叶纹中的一叶内,如湖北鄂州供电大楼出土镜^[18];一种身体呈U形,单独装饰在连弧纹中的三弧内,如德国柏林国立博物馆藏镜^[2]。

由于这3件C类镜均无具体的出土信